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〇七期 ——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412a)

---

【抗拒遗忘】不可抹去的生命血痕	王友琴
【追根溯源】仇恨中长大的革命接班人	凯迪
【青春有悔】光如何灼痛自己——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余杰
【亡灵祭坛】暨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之死	何森
【往事如烟】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三)	老田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 【抗拒遗忘】

### 不可抹去的生命血痕

• 王友琴 •

“你搜集这些普通死者的故事有什么意义？”几年以来，问过我这个问题的不多几个人中，有文科大学教授，也有一般的文革参与者。问这个问题的人，是在某种程度或者某个方面赞赏文革的。我还没有正面地详细地答复过这个问题，因为一则没有机会，二则觉得我所写的一篇篇文革受难者列传都在回答这个问题，三则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本身是需要质疑的。也就是说，我会反问：为什么普通人死者的故事会没有什么意义？

孙历生是一个普通的教师。她和大量像她一样的普通人中的文革受难者，他们的名字和故事，三十多年来从来不准记载和报告。而且，像王蒙这样的作家，从小和她熟识，却用了很大的努力，在其小说中使用了从“庄子梦蝶”这样的高雅典故到“父母打错了孩子孩子不应该记恨”这样的通俗比喻，涂抹在文革往事表层，淡化孙历生式死亡的血痕。以致我们也许应该先提出另一个问题：抹去普通人中的文革受难者的名字和故事会有什么意义？

孙历生，女，1934年生，北京第三女子中学教员。1957年被划为“右派分子”。1

1966年夏天遭到该校红卫兵的野蛮殴打和折磨。1968年她被关在学校中“隔离审查”，7月12日吊死在校中，时年34岁。

#### ◇ 王蒙小说《蝴蝶》中的人物

1996年，在调查中，一位被访者告诉笔者，她在1950年代初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读书，有一位老师名叫孙历生。在文革后，她听说，孙历生老师在文革中自杀了。她很为孙老师难过。但是，她不知道孙历生老师是哪一年死的，也不清楚死在什么地方。她至今清楚记得孙老师教学生唱歌的样子。她说孙历生是一个很美的人。另外，她还听说，作家王蒙的小说《蝴蝶》中的一个女性人物，就是以孙历生为蓝本写的，孙是王蒙妹妹的同学。

《蝴蝶》是1980年代初的“伤痕文学”中很出名的一个中篇小说。这篇小说的重要人物是一个在文革中被“斗争”而在文革后再次身居高位的共产党老干部，围绕以三个女性角色。女性人物之一名叫海云，1949年时是女中学生，单纯热情，向往革命，在共产党进入北京掌权后，和这个共产党高级干部结了婚。他们有了一个孩子。1957年海云因言论被划为“右派份子”后，她的高干丈夫和她离了婚，和另一个女人结婚。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海云自杀，她的高干前夫遭到残酷“斗争”并失去了官位。在文革结束后，他恢复了原先的高职位。

小说题为《蝴蝶》，取义于著名的庄子梦蝶的故事。庄子梦见自己变成了蝴蝶，梦醒之后，不知道是蝴蝶存在于庄子的梦中，还是庄子存在于蝴蝶的梦中。对小说的主人公共产党高级干部来说，则是对在文革中被“斗争”的经历和眼前的恢复了高地位之间对比的感触。对海云在文革中的遭遇，没有作具体的描写，只是简单提到她自杀了，因为被打。小说没有提到在哪一年自杀，也没有提到在哪里死亡。所以，无法从小说中了解她的原型孙历生在文革中的具体遭遇。

这也是那一时期发表的作品的特点。在毛泽东死去两年后，肆虐十年的文革终于被权力当局否定了，但是同时被权力当局硬性解释为是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的罪恶，而不是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人毛泽东的罪恶。虽然文革被否定了，但是当局禁止发表任何超出他们的解释的别的对文革发生原因的讨论。

很明显，如果要推行对文革性质的这种解释，必须少提或者不提文革的具体事实，尤其是不能提千千万万普通人中的受难者的悲惨遭遇。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平反文章，都有级别限制，都必须是《蝴蝶》主人公的“副部级”或者更高。孙历生这样的中学老师是被忽略的。小说是虚构文学，应该有一定表现余地，但是实际上，综合观察那个时代的所有小说，可以看到在虚构领域内，也仍然是被权力当局关于文革的权威结论紧紧束缚的。

文革才一结束，文革的历史已经被有意无意地模糊了。王蒙在《蝴蝶》之后发表的另一中篇小说《相见时难》（1982）里，提到文革重大事件的时候，在时间上与事实相差数月。11年以后，在1993年这个小说收入装订精美的多卷本《王蒙文集》的时候，仍然没有纠正。这也许并不奇怪。既然清清楚楚的文革罪责可以从文革发动者和领导者身上推开，把文革历史事实的时间弄错几个月，不会被重视。

我那时已经了解到，北京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沙坪女士，在经过了红卫兵学生三天的毒打和折磨后，在1966年8月22日在校园中死去。但是，我还不了解这个学校中别的被迫害致死的人。我曾经跟这个学校的一个人谈话，但是没有谈完，这个人就在激动之中挂断了电话。

后来，我从别的学校的老师那里了解到，文革中女三中还有三位老师被迫害而死。三位老师中，数学教师张岩梅是在1966年夏天被抄家和殴打后，上吊自杀的。另外两位老师，名叫方婷芝和孙历生，是在1968年被关押“审查”的时候自杀的。方婷芝在学校门外撞死在公共汽车上。孙历生上吊而死。

这样，我知道了孙历生老师是死在女三中的，死在1968年。但是，我也没能找到“关系”在女三中的档案中查找她的死亡日期。她的死亡日期应该记录在学校的档案里，但是查阅档案记录是不被允许的，除非有特殊“关系”可以找到人帮忙。

一个在五十年代上过孙历生课的学生说，孙历生老师是一个外形和气质都很美的人，后来成为作家王蒙在八十年代初所写的小说《蝴蝶》中的一个人物的原型。那个人物有和孙历生相似的经历：一个参加了共产党革命的年轻的知识女性，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和丈夫离了婚，在文革中自杀了。小说描写了那个人物的单纯和善良，但是对那个人物的死只是含糊地提了一下。小说当然属于虚构文学，作者可以编排自己喜欢的情节。问题在于，在文革中这样的众多的死亡不是虚构的，是真实的。然而，沙坪、张岩梅、孙历生、方婷芝和其他老师在文革中的死亡，三十年来从来没有被允许清楚地记录下来或报告出来。于是，孙历生、沙坪们的死亡，以及这种死亡的异乎寻常的恐怖性，被掩盖被忘却了。在王蒙同时期发表的另一小说《布礼》中写道，共产党像是母亲，母亲有时会错打了孩子，但是孩子决不记恨母亲。这一比喻也多次出现在当时的官方报纸上。这一比喻被官方用来解释和定性文革中普通人身受的迫害，并指示普通人应该如何对待他们身受的迫害。这是一个什么文学化的比喻？孙历生和沙坪们的惨死，以及北京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在文革中受到的残酷迫害，可以作如是比喻吗？这个比喻意味着对生命的轻蔑还是对权力的迷狂？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关于文革的文学描述，也就是后来被称作“伤痕文学”者，在当时起的作用以及影响，是后人难以想象的：读者们排队购买文学杂志，含泪阅读文学作品。在长达12年的压迫之后，在这些作品里，文革的暴虐终于第一次被描写和否定了。然而，“伤痕文学”实际上浅尝辄止，没有被允许深入和发展。《蝴蝶》一类作品就此成为《伤痕文学》的顶峰。对文革的揭示不但没有能再往前进，很快就被这种“父母打孩子”的说法压倒淹没了。非常明显，这种说法要求人们不要追究文革的罪责，特别是毛泽东和他的文革理论的罪责。同时，为了防止追究罪责，就要淡化文革的罪恶。要淡化文革的罪恶，就要禁止纪录文革历史，特别是关于受害者的遭遇。

#### ◇ 1957：划成右派、离婚和强迫劳动

笔者继续设法寻找认识孙历生的人。多方探寻，笔者找到了孙历生的女儿，作了很长的谈话。

从不同的人的叙述中，在笔者所了解的文革和文革前的历史背景上，一个已经被害死三十多年的中学教员孙历生的人生，渐渐地从迷雾中显现出来。

孙历生在1934年5月24日出生。她的父亲是个中学校长，母亲是家庭妇女。孙家住在西四三条小绒线胡同，是自己的房子，一个虽然不大但是整洁舒适的小院。王蒙家和孙历生家是邻居。王蒙的妹妹和孙历生从小是同班同学。因为这种关系，王蒙了解孙历生的故事并将其写进了小说《蝴蝶》。

1949年时孙历生是第三女子中学的学生，接触了共产党员，很快成为第三女子中学的第一个共产党员。1952年孙历生高中毕业，留校工作。有一个共产党高级干部（即于光远

——编者）来这所中学宣传讲话，认识了孙历生。孙历生18岁那年和这个比她年长二十多岁的高级干部结婚，很快有了两个女儿。1956年，她被保送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

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她正在党校学习。去党校学习本来是要给她地位提升的机会。但是，在毛泽东后来自称的“引蛇出洞”鼓励人们批评共产党的时候，她说了一些批评上级领导的话。那时候她的丈夫在苏联访问，因此她被蒙在鼓里，没能了解中共中央的计划——由鼓励“提意见”突然转向，把提出批评的人统统划成“右派分子”。她被划为“右派分子”，被开除出共产党。

孙历生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她的高级干部丈夫按照共产党组织的决定和她离婚。在决定离婚到正式签字期间，她怀孕了。她是大着肚子去签离婚证书的。离婚后，她的前夫在“组织”的安排下和另一个女人结了婚。

王蒙在《蝴蝶》里描写的是“海云”在成为“右派分子”后自己要求离婚，没有说是“组织”强迫他们离婚的，也没有说是身为高级干部丈夫要离婚。显然这样可以避免触及“组织”缔造的无情的制度和无情的理念，这样也把“海云”的不幸在某种程度上转变为她自己的选择而不是“组织”所强迫造成。当然，这是小说，作家不必一定按照模特儿的事情来写。但是，他写的不是平常年代的家庭婚姻，而是在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中的人的遭遇，往哪一个方向改变原型人物，包含有作者对那一段历史的认识在内。

孙历生被送到“天堂河”农场“强迫劳动”。这是北京远郊区的一个劳改农场。“反右派运动”后，大批“右派份子”被强迫离开工作单位到这类农场。一位在“天堂河”附近的另一农场“劳动教养”的“右派分子”告诉笔者，在“天堂河”集中了一批女性“右派分子”。文革后，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前部长在文章中承认，1957年把55万人划成了“右派分子”。有学者认为数字远远大于55万。但是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孙历生的第三个女儿出生在1959年1月，是在“劳改”时出生的。那时候她已经离婚，这个孩子也就一直没有父亲。她的三个女儿，包括没有父亲承认的最小的女儿，都被送到孙的母亲家里，以后就一直由她的母亲带大。

孙历生的大女儿曾经到孙历生所在的劳改农场去过一次。她记得妈妈住的大棚子很黑很脏，到处有蜘蛛网，妈妈睡的床是一根一根没有刨过的木棍钉起来的。有一个人躺在床上，身上裹着纱布，是被卷进机器绞伤了。那个人显然伤势很重。孙历生在喂饭给这个人吃。

孙历生在劳改农场得了心包炎。两年以后她被允许回到女三中。1961年是大饥荒时代最严重的一年。非常明显，这个大饥荒是1958年的“大跃进”直接造成的。但是在1957年的如此大规模的如此严厉的对一切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人的镇压，不但使得疯狂荒谬的“大跃进”无人反对，连随之来到的大饥荒也无人调查和记录事实。

人们在挨饿，即使在相对得到种种优待的首都北京，很多人因为严重缺乏营养得了浮肿病。孙历生回到学校也没有被允许当老师。她在学校的地窖里种蘑菇。当时饥饿如此严重，学校必须设法生产食品以自救，就把“右派份子”分派做这样的劳动。她在“摘帽”以后，才到学校的资料室工作，直到文革。

在劳改农场，孙历生认识了一个和她一样被送去劳改的“右派份子”。那个人和孙历生同岁，也是个中学教员。他们结了婚。孙历生第二次结婚后，又生了一个女儿。孙历生回到女三中工作后，和她的丈夫以及第四个女儿住在一起，离她母亲的家不远。她的丈夫在北京第31中学工作。

#### ◇ 1966：脖子上挂着砖头在玻璃渣上爬

1966年文革开始。8月，毛泽东支持红卫兵运动兴起。短短几个星期内，红卫兵由零星暴力攻击发展到大批打死人。

毛泽东给予全国红卫兵免费交通和食宿到北京来“革命大串连”。北京的市民被动员招待外地来的红卫兵。1966年8月12日，佳木斯第六中学学生吃了孙历生母亲蒸的菜肉包子以后，抄了孙历生母亲的家。他们搜出孙家的房契，说这是“变天账”。他们把孙历生母亲的头发全剪掉了，又打她，还把孙历生从女三中揪来一起打。红卫兵说要搜查私藏的黄金。他们砸碎了孙家的家具，又把天花板全部捅破了，接着又掘地三尺。孙历生的前三个女儿随姥姥住。最小的女儿看到红卫兵挖的坑快有她的身高那么深，以为红卫兵掘坑是要活埋她们，害怕极了。

孙历生的母亲是个家庭妇女，一个和善的老太太，照顾着三个小孩子。只是因为她有自己的房子，被打得不能走路。抄家过后，家具都被打碎了，房子里挖了很多坑。她们只好把木板架在坑上睡觉。

这并不是孙家特别的遭遇。在离孙家不远的小绒线胡同25号，有一个叫梅梅的十来岁的女孩子，她的父母都被红卫兵打死了。这是一个不长的胡同，在1966年夏天有近十人被打死。8月，北京有自己的住房的人，几乎都遭到类似的遭遇。还有相当数量的房产主被活活打死。在红卫兵的暴力攻击之后，他们交出了自己的房契。随着红卫兵的行动，中共中央在1966年9月24把住房收为国有。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红卫兵行动和政府行动的关系。

这个行动的结果，是北京有52万间私人房屋被“收归国有”。没收这些房屋是否需要殴打甚至残杀孙历生母亲这样的老人，是需要提出的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对根本没有反抗的人民，权力当局实行这样的迫害，是另一层犯罪。这种由当权者组织的大型犯罪行为，需要有特别的称呼，以区别于一般的由个别人或者小型犯罪集团实行的犯罪。

女三中校长沙坪在8月22日被打死。沙坪在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连续四天被关押在学校中遭到毒打和残酷折磨，直到被打死。在沙坪被打死的过程中，孙历生一直是“陪斗”的人之一，因为她是老师，而且是“右派份子”。“地富反坏右”，所谓“五类份子”，文革前就是打击对象，到了文革，有新的“敌人”也被加进了革命铁锤下的铁砧之上，对旧有的“五类份子”来说，发生的是所受压迫的升级。

女三中虽然是女校，只有女学生，但是该校红卫兵打人非常凶猛残酷。沙坪被打死，还有校外的“牛鬼蛇神”也被抓进学校里打死。

在1966年夏天，红卫兵曾经把一根细铁丝两头都拴上两块砖头，挂在孙历生的脖子上。这还不够。他们还打碎玻璃瓶，把玻璃碴铺在地上，强迫脖子上挂着四块砖头的孙历生和别的一些老师在玻璃碴上爬行。碎玻璃扎进他们的膝盖和手掌，鲜血淋漓。

文革的血腥残忍的历史记载的缺失，使得关于文革的评价和有关争论失去了基础平台，因而悬空，模糊，似是而非。

#### ◇ 1968，吊死在“牛棚”窗上

然而孙历生没有能活过文革的第二轮迫害高峰。1968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是文革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迫害人的高峰时期。毛泽东亲自批发了一系列的文件，指导在

各个单位整人。那个时候，各单位已经成立了新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组织领导“揪出”和“斗争”所谓“隐藏得很深的阶级敌人”。孙历生再次成为重点对象。她被关在学校里，不准回家，当时权力当局用的正式术语叫作“隔离审查”。

和斯大林迫害人的不同之处之一是，除了动用专业的“专政机关”之外，毛泽东迫害人还大量地在各个单位进行。在各单位对大量的人员进行“隔离审查”，就需要在各单位建立监狱。这种在每个单位建立监狱关押本单位职工的做法，目的是要逼迫人“交代问题”而施行进一步的惩罚。同时，这种隔离本身就是一种残酷的虐待和折磨。在北京和全国，在每一个学校，都有一批老师被“隔离审查”。大批人死在“隔离”中。把孙历生这样的教师们长期关押，剥夺自由，施行心理的和肉体的折磨。对发动和领导这样的“运动”的人，如果不称之为“虐待狂”，应该用什么名称比较合适？

1968年7月12日，孙历生吊死在女三中校中。学校“革命委员会”说她“自杀”，但是从来没有说孙历生留下了自杀遗书。

孙历生的母亲一直对女儿的死怀有疑问。因为在孙历生死亡的前一天，孙历生曾经悄悄离开学校，来到母亲的家中。她和母亲有过一场短促的谈话。然后她就匆匆离开，回到她学校中去了。

那天孙历生告诉母亲，她在学校中被整得非常厉害。整她的人是学校里的同事，以前是她的好朋友，现在这个人很是得势，在“革命委员会”里面，拼命整她，“揭发”她。她是很难逃过去了。她还告诉母亲，她的同事方婷芝老师，已经撞在公共汽车上死了。（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方婷芝老师死于孙历生之前。）

孙历生从隔离室跑到母亲家和母亲谈话的那天，她的第三个女儿在场，她缩在床上，假装睡着了，片片断断地听到了母亲和姥姥的谈话。她记住了方婷芝的名字，另外，她记得妈妈提到她家门口的石榴树。那时候她9岁。妈妈离开后，她在被子下面悄悄地哭了。

孙历生的母亲和孩子一直不相信她会自杀。他们说，她在前一天偷偷回到母亲家的时候，说的是怎么对付整她的人，没有流露任何要自杀的意思。最重要的是，他们说，她是母亲，而且，她是一个非常爱孩子的母亲。她有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其中最小的一个只有7岁。她的孩子需要她抚养。她不会丢下四个孩子死去。

另外，他们说，从1957年被划成“右派份子”到1968年，孙历生已经经历了离婚，劳改，以及红卫兵的残酷殴打和折磨。她不是一个没有受过苦的娇弱的女人。她不会轻易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们想要知道，在孙历生死亡以前，究竟发生了什么？

孙历生死亡的时候，已经在学校里被关押“隔离”了很久。期间曾经有一次被允许回家。可能是回家取粮票。她和第二任丈夫以及他们的女儿住在一起。那也是她最小的女儿最后一次见到她。小女儿记得妈妈回家的时间很短，爸爸为她做了鸡蛋炒饭，装在一个铝饭盒里，让妈妈带到学校去。那时候北京一般市民的生活都很苦，孙历生那个年龄的教员工资很低，加上他们两个人都是“右派份子”，境况更差。鸡蛋炒饭要算是很好的食品。在短促的回家时间中也只来得及做鸡蛋炒饭。

孙历生的前三个女儿也说，继父对待母亲很好。两人都是“右派份子”，都受到外界迫害，但是家里没有问题。这也是她们不认为她会自杀的一个理由。

然而，尽管有种种怀疑，在1968年，孙历生的家人不可能调查她的死亡。当时，孙历生的父亲也被“隔离审查”，她的母亲是个老年家庭妇女，她的最大的女儿只有14岁。她的身为共产党高级干部的前夫也被关了起来。她的第二任丈夫自己也是教员和“右派份子”，也在被整。

孙历生死后，尸体火化了。对自杀的人，当时称之为“对抗运动”“死有余辜”，不准留骨灰。孙历生的丈夫偷偷抓了一把骨灰带回家中，保存起来。但是，不久以后，他也去世了。孙历生的骨灰不知所终。

孙历生死亡一个月之后，他的妹妹的丈夫也死了。他的名字是高经国，是七机部第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他在被“审查”的时候从六楼上坠楼，七八个小时死亡。他的妻子闻讯赶去，却不准他和丈夫见面。高经国死时27岁。

高经国在四川农村长大，他的父母生了七个孩子，只养活了两个，他上了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工作，和妻子一起住在岳母家中。一九六六年岳母被抄家的时候，他的妻子生了孩子刚刚从医院回到家中，也被抄家的红卫兵罚站。一九六八年掀起又一轮迫害高潮，高经国死亡，他的孩子只有两岁。他的父母得到他的死讯，数月后就都因忧伤过渡而死亡。

孙历生死亡的那一时期，是文革最恐怖和残忍的时期之一。经过两年的文革，迫害变得越来越组织化了，也更加深入细致了，越来越无法逃遁了。

◇ 谁杀害了孙历生？

孙历生死后，她的家人的心里一直没有安宁。

孙历生的母亲认识孙历生所说的那个在学校整她的那个人：她们俩曾经是同学和朋友。孙历生和高级干部丈夫结婚时，经济条件优越，还常常拿出自己的工资接济这个朋友。后来两个人中间有了矛盾。在1968年，那个人进入了“革命委员会”任职，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后，狠整孙历生。孙历生的母亲认为女儿是被这个人整死的。女儿死后多年，听说这个人病了，病得不轻。这时候孙历生的大女儿已经长大，酷肖其母。孙母拿出了一件孙历生生前常常穿的衣服，让孙历生的女儿穿上，看起来好像孙历生又复活现世一般。她说要让外孙女到那个人家里去“闹鬼”，让那个人看到，以为是孙历生的冤魂来索命，一定非常害怕。

这件事情实际上并没有进行。但是，受害者家人的这种心情是容易理解也令人感叹的。不要说文革未结束前，甚至在文革后，即使受害者得到了“平反”，但是，作恶者上至毛泽东，下至各单位打人整人的人，都没有受到责任追究。受害者的家属失去了他们的亲人，痛心之至，却完全没有办法诉诸司法正义，对害人者做哪怕是很轻微的惩罚。在无可奈何之中，他们只能作这样的想象中的报复。

1978年，毛泽东死了两年以后，压在受害者头上的大石板终于开始松动了。邓小平和胡耀邦给1957年的“右派份子”“改正”，给文革中的受难者们“平反”。各个单位为死去的人开了“追悼会”。孙历生的女儿们想了办法，在八宝山给母亲开了追悼会，虽然按照当时的规矩，孙历生这样级别和地位的人是不可能有人在八宝山开追悼会的待遇的。在当时的报纸上发表给文革受害者平反的文章，对受害者的级别有严格的控制。

她们寄出了100张请帖，来的人却有好几百。其中有孙历生小时候的老师，那时候已经80多岁了，流着眼泪回忆那个热情漂亮的学生时代的孙历生。来宾中也有和孙历生一样在文

革中受到残酷殴打的中学教育工作者。其中之一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校长高云。高云在1966年8月遭到红卫兵学生毒打。红卫兵以为他被打死了，把他送到了火葬场。因为当时被红卫兵打死的人太多，北京的火葬场的焚尸炉供不应求，火化尸体要排长队。在等待过程中，高云在死人堆里醒了过来，爬了出来。高云幸运逃过一死，但是他校中的两个同事，靳正宇和姜培良，都被红卫兵打死了。高云在追悼会后还去看望过孙历生的孩子们。共同的文革悲惨遭遇使他关心孙历生的家人。孙历生的前夫于光远没有来参加这个追悼会。

许多年来只有一个人表示过歉意，是陆定一。陆定一在文革前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1957年孙历生被划成“右派份子”，罪状之一是曾经说过陆定一“作风粗暴”。在她，大概只是批评一个丈夫的同事，但是在1957年被认为是“反党”。陆定一为此向孙历生的女儿道歉。陆定一的这种道歉，所以应该被记载。陆定一是所谓“彭罗陆杨”，即文革中最早被“打倒”的四个中共高级干部之一，在文革中长期被关押，吃尽苦头。但是，即使是在那些受到长期迫害的人中间，能对自己所做过的迫害他人的事表示道歉的人，非常非常少。相当多的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人，虽然亲身经历了迫害的痛苦，却并不对他们自己迫害过他人表示悔过。因此，对少见的忏悔者，尤其应该肯定。

没有任何女三中的人来道歉过。那些在1966年给她头颈上挂砖块强迫她在玻璃渣上爬行的人，那些在1968年把她“隔离审查”致死的人，都没有来向孙历生的家人道歉过。道歉不能使死者复生，也不能使事实回转，但是道歉不但表示是非方面的澄清，也是一种道德上的救赎。没有几个在文革中和文革前迫害了别人的人道歉。表明文革毁坏的，不但有人的生命和生活，还有道德水准。

最早告诉笔者孙历生的名字的那位被访者说，她认识的一些在文革中用残酷手段迫害他人的人，在文革后居然毫不惭愧地说：“我们当时就是跟着毛主席革命。”那么，只要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还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的尸体还在水晶棺材中受人瞻仰，他们仍然可以有恃无恐。毛泽东时代长期的大规模的迫害，不但造成了千万人的悲剧，而且不断强化和灌输一种哲学，好像一个政权是可以这样迫害人的，这样做是天经地义的，这不过是像父母打孩子。这个比喻至少错在三个方面。第一，政权不像人民的父母。父母供养孩子，政权并不供养人民，而是靠人民供养。第二，人民所受到的迫害的残酷程度，如孙历生所受，决不是父母打孩子的程度。第三，在现代法律上，父母虐待和杀死孩子，也是要被判罪的。这个“父母打孩子”的说法的实际意义，就是在文革被记录和清算以前，就原谅了文革的罪恶。

时间过去。对于孙历生的死，她的家人虽然心里一直不平，但是也没有办法找到证据来证明母亲是被害死而不是自杀的。2000年，一件新发生的事情又使这创伤被打开了。

北京的银行处理长期没有人来认领的存款，其中有一张孙历生名下的存单。银行找不到孙历生也找不到孙历生的家属，后来了解到了孙历生的前夫是很有名的高级干部，就把关于孙历生的存款的消息，通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通知了于光远。

孙历生的这笔存款，数额不小。可是，孙历生死以前，却没有把这笔钱交待给她的家人。特别是，她身后留下了四个未成年的女儿，其中最小的年纪只有七岁。如果她真是自杀的，为什么不把这笔银行存款交待给家人，作为小女儿的生活费呢？这仅仅需要写一个简短的纸条说明就可以了。即使确实孙历生当时陷于绝望万念俱灰不想再活下去，她也不会要剥夺她的小女儿需要的这一笔钱呀。但是，孙历生没有写自杀遗书，也没有告诉孩子有这样一笔钱。是她没有写？还是她写下的遗书因为揭露了关押她的人的罪恶而被销毁了？或者，她本来就不是自杀的？这笔存款的发现，给孙历生的女儿们重新带来了巨大的心理震动，使他们再一次对母亲的死亡发问：她真是自杀的吗？还是在“隔离审查”中被打死了？她会不会是被打死以后再挂在



窗户框子上的？如果她是被人害死的，谁是害死母亲的人？

孙历生的大女儿记得，她小的时候有一次天气突然变冷，孙历生一夜没有睡觉，给她织好了一副毛线手套。她的三女儿听到过她死亡前一天跟姥姥谈话时提到石榴树，她了解到孙历生那时候住的地方，确实有一棵石榴树。母亲对他们不是梦，而是有血有肉充满母爱的活人。他们幼年丧母，三十年后伤疤再次揭开，痛苦之重难以衡量。

有一个真实故事也能说明孙历生的女儿的怀疑有其理由。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副校长、化学老师刘美德在1966年夏天受到该校红卫兵的残酷殴打折磨。她当时正怀孕，红卫兵学生明知如此，仍然剃了她的头发，押她游街，逼她吃脏东西。还有一次红卫兵强迫她跪在桌子上，把脚踩在她的背上，摆好姿势，由一名报纸记者拍下照片后，把她一脚踢下桌子。然而，刘美德遭遇的不仅仅只是这些公开的暴行。年底，因为红卫兵到全国“革命大串连”，学校里的人很少，比较冷清。刘美德每天在学校里“劳改”，打扫卫生。有一天，她在楼上擦走廊的窗子。有两个女红卫兵走过她身边，进了厕所。刘美德在他们后面到厕所里取水。她进去厕所以后，竟然听到两个女红卫兵在商量：我们可以把她推下去摔死，不会有人知道，然后就说她是自杀的。这两个女生正在排便，是在厕所的隔板后面，不会看见刘美德进门，但是刘美德能听见他们的谈话。她闻此大吃一惊，急忙蹑手蹑脚走出厕所，远远避开这两个人。从此以后，她总是注意要在人多的地方“劳改”，以免被突起杀心的人暗暗害死。刘美德被“斗争”时怀的婴儿，生下不久就死亡了。但是刘美德活了下来并告诉笔者她的遭遇。如果孙历生能在地下和我们谈话，她会说出什么呢？

在刘美德的故事里面，还只是一些中学生表现出来的邪恶。文革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实施和展现那些通常被社会常规压抑的恶念。那些高高在上大权在握控制引导整个文革的人，是怎么下令残害千千万万的中国人的呢？他们掌握生杀大权，他们看到文革害死无数的人，他们的内心是如何筹划这一切的呢？

文革的残忍和人性的阴暗，深不可测。

~~~~~

## 【追根溯源】

仇恨中长大的革命接班人

• 凯 迪 •

好多学者争论，为什么会有文化大革命？这问题可复杂。包括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文革？为什么老百姓那么积极的投入？为什么红卫兵那样狂热？

有的问题对过来人不算问题，本来就应该是那样的！比方说，为什么十几岁的孩子那么野蛮，打死人都不带眨眼的？因为打的是坏蛋！见着坏蛋不打那才叫人弄不明白呢！红卫兵从小受的是仇恨教育。就像老故事里说的，母亲从小一遍遍的告诉儿子长大了可要报血海深仇呀。终于有一天发现了仇人，当儿子的还能干别的吗？非上去往死里打不成。

残忍是教出来的，从小学就参观各类展览：农奴主挖穷人的眼睛，剥人皮作灯罩，拿活人点天灯，知道国民党抓着共产党就上老虎凳，钉竹签子，最厉害的刑法叫“披麻带孝”，知道地主刘文采把农民关水牢，拿气筒子往人肚子里打气，一直到肚皮爆炸，刚一听是毛骨悚然，然后就是恨，恨地主，恨国民党，恨资本家，向他们报复，而且同样的残忍，那是不言而喻天经

地义的。谁都没告诉我们只是一小部份地主国民党才坏成那样，刘文采也根本不代表所有地主。这一忽略能造成多可怕的后果直到文化大革命才知道。

#### ◇ 经过培训的“忆苦思甜”

要把天真烂漫的孩子都教育的一门心思想着打坏蛋干革命可不是三五天就能见效。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就常听老贫农老工人的忆苦报告。他们准都经过培训，因为好些句子每个里都有，象天下乌鸦一般黑，就是说凡地主资本家财主没一个好的，“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别进来”意思是穷人受了害别希望靠讲理找回公道，天下穷人是一家，只有穷哥们还能帮一把，来了救星共产党，接着就是穷人怎么打地主分田地了。

每次听完报告就得写作文，然后老师就表扬谁的作文好。好作文全都是满怀阶级感情。证据一般是：“当我听到杨奶奶万般无奈拿孩子换了二斗麦子时，难过得流下了眼泪？”谁不想受表扬呢？于是我打定主意下回也哭。不过这可不太容易，因为我从小就不爱哭，从上小学连我爸爸揍我都不哭，越揍越瞪眼。这回为了受表扬必须努力。等又听忆苦报告时，我拼命使劲，听到地主逼债，卖孩子，要饭挨狗咬，确实有点难过，可就是流不出眼泪。心里可越来越急，快到“来了救星共产党”，那可就不能哭了，这回的作业又要完了。终于，我连着急带难过挤出了两滴眼泪。然后呢，必须让同学看见，好作见证。于是我向左转头，左边的同学泪流满面，根本不看我，再向右转，右边的同学也闪着泪眼只往前看，于是回头，后边的怎么也免不了看我一眼吧。等报告完了，我正高兴的构思作文，就听老师说：“今天全班同学都很好，只有个别同学不认真，东张西望。”说着还狠狠地盯我一眼。我顿时浑身发凉：完了，又完了。

除了请老贫农老工人作忆苦报告，还让我们自己回家受教育。有篇作文“我和爸爸比童年”，我来的快，没十分钟就想好了。爸爸小时候给地主放牛，吃不饱穿不暖，还常挨打，后来爸爸参加了八路军，把狗地主抓住枪毙了。这故事有点太熟，好像听过。不过没关系，天下地主一般黑，天下穷人也差不多。我对构思很满意，只等爸爸点头认可就能落笔成章。找着爸爸我开门见山：“爸，你小时候净吃苦吧？”我有把握，爸说过不只一回，他小时候常受罪。果然，爸爸说是。我马上切入正题：“你给地主放牛尽挨打吧？”爸爸纳闷，说他没放过牛。我有点喘不上气来：没放过牛？那我的作文怎么办呀？爸爸又说他放过几天羊。我这才缓过来：羊是点儿，可也凑合了。赶紧问：“地主尽找茬打你吧？”爸爸更糊涂了，问哪个地主，干嘛打他呀？“你放羊没放好呀。”爸爸还不明白，说：“谁打呀？羊是自家的。”我眼珠子快瞪出来了：什么！自家有羊？穷人都是吃糠咽菜，全家盖一条破被子，怎么能有羊呢？我缓缓神质问爸爸：“你不是说你小时候净吃苦吗？”爸说是啊，那会儿过年才吃顿白面，平常连玉茭子面（玉米面）都吃不上，净吃山药（白薯）。我更是又气又急：那么好吃的白薯，我想吃都吃不上，他净吃还说是苦？！我绝望中想起：“你不是说你十几岁就参加革命了吗？你打过坏蛋吧？”我琢磨着：给地主放牛那段就算了，就从爸爸当八路军打日本鬼子写吧。可爸爸说他在地方上不在部队上，没打过仗。什么叫“地方上”？不大懂，可还不死心：“日本鬼子来了呢？”我心说，见了鬼子你该打了吧？爸爸说鬼子一扫荡他们就钻山沟。“埋伏起来打？”“到山沟里藏起来，叫鬼子逮不着。”啊？！见着鬼子不打，藏起来怕鬼子逮着？！我气得快哭了：这也叫参加革命？完了，完了，挺好的作文全让爸爸给给毁了。

我还抱着希望问了妈妈，“我和妈妈比童年”，行吧？可结果更糟。妈妈说她曾考上了开封女一中，名校，她爸爸，就是那个我从没见过的姥爷，可高兴坏了。我心里真紧张，旧社会什么人才能上中学？这姥爷别是地主吧？妈妈说她爸爸是商人：我赶紧琢磨：好人有共产党，红军，八路军，老贫农，工人……，坏蛋呢，有国民党，日本鬼子，地主，资本家，哎呀，有当铺掌柜的，这是商人吧？妈妈又说她爸爸是买卖药材的。我略微松口气：坏蛋里好像没听说有卖药材的。妈妈接着说开了，说她在开封有段好日子，她爸老去看她，给她买好吃的，有酱

牛肉，想吃多少吃多少。妈妈回忆的挺高兴，没发现我有多么迷惑多么难过：在万恶的旧社会，什么人才能猛吃牛肉呢？就连“比蜜还甜的新社会”，也不行呀，我就特爱吃酱牛肉，可一年也见不着几回，而且每次刚吃到更想吃的时候就没了，从来就没有过“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爸爸妈妈说的和课本里，广播里，老工人老贫农还有老师告诉我们的太不一样了。哪个对哪个错明摆着！我为有如此可疑的爸爸妈妈而心情沉重。

还没到文化大革命呢，我们新中国少年儿童已经装满了一脑袋的革命思想，全班，全校，全北京，全中国都一样，别管男孩女孩农村城市，也别管出身革命家庭还是剥削家庭或是可疑家庭（像我这样的）。世界简单极了，一共分成两个：新社会和旧社会，所有的人也分成两拨：好人和坏人。旧社会是坏人压迫好人，好人老作苦工，吃不饱穿不暖，还老挨皮鞭子。后来毛主席共产党来了，领着好人把坏蛋打倒了，就成了新社会。但是还没完呢，蒋介石溜到台湾去了，还在那维持着旧社会。美国，英国，法国之类的资本主义国家也是旧社会，那里的坏蛋整天花天酒地，好人呢，都在水深火热之中，就等我们去搭救了。可有一样不明白：咱毛主席怎么还不发命令呢？

我们班上大个子同学刘力告诉我们一个秘密消息：快跟美国打仗了！我们激动得瞪眼：是吗？！刘力一脸的得意：“给美国的严重警告不是快到500次了吗？”那会儿美国飞机老爱侵犯中国领空，侵犯一次中国就宣布一次严重警告。刘力说：“一到500次就要和美国开战了！”我们高兴坏了，比盼过年还急的盼着美国飞机侵犯领空。终于有一天，严重警告500次了！可是没开战。我们一肚子的气质问刘力。他的脸都急红了，小声说好像又改1000次了。我们顿时失望的要哭：1000次？还得多少年呵？

有个滑头滑脑的同学张小丁说他知道为什么不和美国开战为什么不解放台湾。我们赶紧问为什么，他小声说美国有航空母舰，还有第七舰队，特厉害。我们全同意：解放军用木船都能打败军舰，电影里都演了。张小丁却不服，说航空母舰有飞机有导弹，比鱼雷快艇厉害多了。我们全都不信。可张小丁还冷笑着说是。刘力一瞪眼，说那咱们试试，你当航空母舰，我当鱼雷快艇，看谁厉害？话没说完就一下把张小丁的胳膊狠狠的拧到背后，疼得他直冒眼泪赶紧求饶。我们全都心满意足：还是鱼雷快艇厉害。

#### ◇ 从小心中就充满了仇恨的怒火

那是1962，1963年，蒋介石闹着反攻大陆。福建前线捷报频传。炮轰金门，抓美蒋特务。连小学生也参战，他们的故事上了广播和电影，叫“英雄小八路”，我们羡慕得要死，特别恨蒋介石不往北京派特务。当然我们也知道到处都能有坏蛋，不光是特务，还有阶级敌人，比如掐死少先队员刘文学的狗地主，我们一边惋惜刘文学一边有点不明白：为什么狗地主能留到今天呢？当初全打死不就没事了吗？我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睁着眼到处找坏蛋。一天上学的路上有个半疯的老太太，见着背书包的就问：“小同学，你在哪上学呀？学校在哪呀？”平时可没人这么问，刘力觉得“有情况！”这儿的人都知道学校在哪，她怎么就不知道呢？是不是特务？我们立刻觉得像：那老太太三角眼，还有大金牙，真像特务啊！于是我们跑到学校一起向老师报告，然后都盯着他就给一个字：“抓”，张老师很严肃地想了半天，说同学们的警惕性很好，……咱们先上课吧。我们失望极了。

除了恨坏蛋，我们也爱人民。对敌人像冬天那样严酷，对人民像春天般的温暖。这可是雷锋叔叔说的。

有一天早上，还没开校门呢，门外像往常一样等着一大群学生。突然来了位老太太，虽然

还是老太太，可一没三角眼二没大金牙，戴着个旧草帽，领着个小女孩，她们都穿的破破烂烂。那是困难时期，我们的衣服上也常有补丁，屁股上补个大圆或半圆，膝盖上也补两大块。可这老太太和小女孩的衣服上补了就太多了，数不清。还什么色的都有。这种人当时的北京不多见，大概是从农村来的。我们脑子里不约而同地冒出两个字：穷人。老太太冲着我们鞠躬：小同学，给点吃的吧，实在饿坏啦。有些学生是一边吃着饭一边来上学，手里还有半个馒头或火烧之类的，马上就给了老太太。老太太赶紧给小女孩。然后一边流眼泪一边继续鞠躬：谢谢小同学，谢谢小同学，谢谢大哥哥大姐姐。可那小女孩两手抓着馒头火烧，嘴里满满的。噎得又伸脖子又瞪眼，像公鸡要打鸣。我们特受不了穷人的感激。赶紧继续搜索吃的。我看见刘力走过来，立刻冲过去。那小子早上老吃好的，糖包，枣馒头，糖火烧，都是从机关食堂买的。我爸爸妈妈也在机关，可很少给我买好吃的，早上老是棒子面粥，馒头咸菜。所以我特眼馋刘力，可还得装出一点不馋：看都不看他，今天可有理了，我上去就把他的半拉糖包夺下来，他刚瞪眼我就理直气壮的说，穷人都饿坏了！刘力一句话都没说出来，只好气哼哼的四处张望。谁有吃的立刻扑上去，高年级的也不怕，只要说是给穷人的，没一个人说不。那老太太一会儿功夫就捧了满满一草帽吃的，还不停的鞠躬，我们心里舒服极了，就没一个人想过：本来应该在旧社会的穷人怎么跑到新社会来了？

那三年困难时期老觉得肚子饿。老师上课说，咱们周总理向全世界宣布了，虽然中国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可是没有饿死一个人！我们胸中立刻冒出一股自豪，肚子马上不饿了。老师又说缺粮食不光是自然灾害，还有苏联逼债，趁火打劫。可咱们中国有骨气，勒紧肚皮，一分钱都不少他的！我们心中的豪气继续膨胀，不光不饿了，还觉得有点撑。刘力下课告诉我们，苏联坏透了，给他们苹果他们还拿铁圈套，大了小了都不要，非得正好。我赶紧问：那他们不要的怎么办呢？刘力说那也运不回来了，都烂在那了。看完“甲午风云”，恨不得马上抄起棍子去打小日本，听完了火烧圆明园和八国联军立刻就发誓长大非找所有帝国主义拼命。别看苏联老大哥叫了那么些年，让我们转过脸来恨他们也用不了三句话。

我们只听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长大干什么呢，就仨字儿：干革命！一切都再清楚不过，还能干什么别的呢？唯一的问题是有劲没地方使：身边的敌人都让革命先辈们消灭光了，剩下的蒋介石和帝国主义都躲得远远的，让我们够不着。所以呢，文化大革命一来，突然知道身边还隐藏着那么些敌人，简直把我们乐坏了，欣喜若狂，憋了那么些年的劲一下全使出来了。那股子疯狂别说现在的人不信，连自己回头看也不敢信了。

红卫兵干过坏事：绝对该骂。可他们也有资格高声质问：是谁把我们教育成疯子的？！

~~~~~

## 【青春有悔】

光如何灼痛自己——评陈凯歌《少年凯歌》

• 余 杰 •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籍籍无名。他不参与官方的作家协会，也不在媒体上露面。作为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作为苏军占领下的匈牙利居民，他的生命有一大半被黑暗所包裹。他从来不曾想过离开自己的祖国，但他也不曾以“爱国者”自居，他说：“我目睹、我亲历这个国家的疯狂堕落，在妄想中自毁。每天，那些充满仇恨的国家捍卫者以及我真切的记忆，都驱使我疏远。我对她（祖国）的冷漠与日俱增。我也慢慢尝试着离去。然而语言，是的，就是它把我拴住了。这是多么奇怪。这种陌生的语言，却是我的母语。”他以写作对抗黑暗，以写作捍卫记忆。在表达自己的创作观念时，凯尔泰斯说过：“每当我构思一部

新的小说，我总是要想起奥斯维辛集中营；我无论讲什么话，我想到的也是奥斯维辛，我是奥斯维辛的发言人。”他的作品强烈反映着这个信息。正是因为这样的信念，他用他的笔，毕生反抗那些让人成为非人的力量。

如果说对犹太人来说存在着一个永远的“奥斯威辛”，那么对中国人来说则存在着一个永远的“文革”。这是一个真实的噩梦，而记载这个噩梦，依然是文化人的职责所在。可惜，在当代中国的文字材料中，这样的记录实在是凤毛麟角。这无疑是当代汉语的耻辱以及使用汉语写作的人们的耻辱。陈凯歌意识到了这种耻辱，应日本一家出版社的邀请，他写下了薄薄的一本《少年凯歌》。数年之后，《少年凯歌》才被辗转传回中国，才有中文版的问世。这一过程本身就充满了戏剧性，也表明了在下时的语境下，言说和记载噩梦的困难。在《少年凯歌》中，陈凯歌迈出了第一步：直面自己的少年时代，勇于审视“不堪回首”的历史，承认青春时代曾经犯过的错误，并为旁观甚至参与那个时代的罪孽而忏悔。仍有批评者指出，在对自己家庭和父辈的叙述中，陈凯歌还是有某些保留和回护。但我认为，对于陈凯歌来说，写下这些有“思痛录”意义的文字已是难能可贵了。毕竟陈凯歌已经是一个“成功人士”，而“成功人士”要说几句真话尤其困难。与某些一听“忏悔”就蒙起脸来匆匆逃跑的才子相比，与某些依然振振有词地宣称“青春无悔”的文人相比，与某些企图在“文革”的废墟中寻找“民主”种子的学者相比，陈凯歌的这种即便是“有限度”的自省，也应当给予鼓励和赞赏——说一点真话总比完全说假话好。

《少年凯歌》中的那个懵懂的少年，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大饥荒中饿毙街头的“眼睛里泛着白光”的尸体，也看到了“文革”初始阶段北京红卫兵的血腥暴行。显然，陈凯歌的少年时代并没有享受到“阳光灿烂的日子”——那样的日子仅仅属于作为高干子弟的“联动”分子们，属于作为军队及部委大院中的“大院子弟”的王朔们。那种“灿烂的阳光”不是真光，而只是镜子的反光。它只能欺骗眼睛，而不能保存记忆。《圣经》中，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可是，有多少人能够承受光的灼痛呢？一位西班牙文学评论家在关于凯尔泰斯的采访中写道：“他的微笑，是一种隽永的姿态，对这个对他不公的世界的调和。而他友善的本性看起来是对他所感知的凶残和苦难的最慷慨的复仇。……他就是这么一个人，在别人只感觉到凄凉和精神错乱的地方，他创造着作品和文化。”在灼痛中微笑，在一无所有中创造，这是凯尔泰斯的伟大之处，这也是当代中国文化人最缺乏的质素。陈凯歌是一名有创痛感的文化人，从《孩子王》、《边走边唱》到《霸王别姬》，他一直试图用电影完成记忆，完成对光与黑暗的定义。“光亮有时不过是黑暗安装的一道门，推开门就又走了进去。”他的野心只是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他不断地在退让、妥协和言不由衷。因此，他在《少年凯歌》中忧伤地写道：“我听见自己儿时的歌声，嗅到那个年代北京晚秋的空气，我竟能回味此时第一次吸烟的滋味，隔着烟雾，我看到死去朋友的脸。”他还是没有洞穿光的意义，而在历史的迷宫中陷入了困惑：“当他们再次站在起点上时，鬓边已有了华发……他们想得到的，可能就是和他们并肩站在也是终点的起点上，却隔着时间的界限。”

那个“文革”中成长的少年，似乎还在奔跑，还在呼喊。那时，曾经“当众把自己和父亲一点一点撕碎”；那时，眼看着母亲那么久那么久地被迫面壁而立，而自己只是呆若木鸡站在一旁；那时，眼见过那么多同学、战友、插友们疯的疯、死的死，四散飘零。于是，他只能这样写作：“在审判台空着的时候自己走上去，承担起自己应承担的那部分责任。”也正因此，陈凯歌把这本书，称为“我的自供书”。死亡是少年最好的老师，从看到死尸的眼睛的那一刻起，少年就从被欺骗中脱颖而出。“在我渐渐懂得，艰难和困厄乃是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之后，触动我的反而更多是力量。”在一段段镜头般细腻沉静的描述中，混杂着作者几多的依恋、自责和迷惑。我听到“中年凯歌”不断向“少年凯歌”发问，但总是得不到确定性的回答。

《少年凯歌》既富于反思和批判的精神，又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和历史鲜活性。比如，经

过几十年的宣传和灌输，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间“三年自然灾害”的说法已然定格成一个“历史名词”。在官修的历史教科书中，老师把这个虚假的概念向一代又一代的孩子们宣讲。然而，有学者在详细研究了那三年的气象、水文等资料后指出，那三年不仅不是遭遇重大自然灾害的三年，反倒是“风调雨顺”的三年。所以，那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灾荒，与其说缘于天灾，不如说真正是缘于人祸。于是，又有人说，是苏联逼迫我们还债，灾难是苏修造成的。而陈凯歌则认为，一九五九年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开始以农产品偿还朝鲜战争借款，这固然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是，早在苏联逼迫还债之前。饥荒就已经在许多地方蔓延了。苏联的“背叛”并不是产生饥荒的根本原因，而仅仅是加剧了饥荒的程度。他用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个观点：“同苏联的冲突，仿佛一个举着雨伞在阳光中行走的雪人一样，偶然遇到一场暴雨，不仅可以避开晴日带伞的猜疑，而且还可以为自身的融化找到依据，这是一场及时雨。一九五八年全国性的‘大跃进’才是六十年代大饥荒的起因。”

《少年凯歌》摒弃了名人写自传时常有的自恋心态，而以普通人的视角娓娓道来，平实而真诚。陈凯歌看透了所谓胜利者的“历史”——这种历史是一大堆论证“胜利者”何以“胜利”的文字垃圾，那里没有失败者的位置。陈凯歌认识到，那些堂而皇之的、摆在书架上的“历史”，也许比他本人虚构的电影世界还要不可信——在当代中国，电影（或者小说）与历史，究竟哪个是虚构的、哪个是真实的呢？《霸王别姬》这部倾注了陈凯歌最多心血的电影，穿越了不同的历史时空，展示出了生命鲜活的质地与文明衰朽的历程。在华丽和颓废中，在完美和破碎中，《霸王别姬》所凸显出来的“历史”，更迫近一种“真实”的生存状态。哪个中国人能摆脱“优孟”的命运呢？我们的人生早已高度地戏剧化了，因而我们的戏剧比我们的人生更为真实。我们都是程蝶衣的观众，我们又都是程蝶衣本人。我们在观看程蝶衣被凌辱的命运，其实我们的命运何尝不是时时处于被凌辱的位置？我们与程蝶衣一样，梦想自己成为光，却又被自己所灼伤了。

□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居北京，原载《观察》网站

## 【亡灵祭坛】

暨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之死

• 何 森 •

每逢圣诞，我们两老照例参加洛杉矶基督教六校联欢会，每当校歌唱到“韶光几度，花娱鸟乐，饱受春风雨……”又好象把我带回“平原广阔，了近目前，江水流其间”的康乐园。

一九三九年我在香港史塔士道岭南附小读书，抗日胜利后又在广州康乐村念岭南附中，跟着又读了四年岭南大学，又在电机工程系兼任助教一年，可以说，一生中所受教育的不少时间都离不开岭南孕育，而人生最激情的高峰，即是拍拖的年代，也在此岭南康乐园的仙境渡过。

岭南两位恩师更是毕生难忘，陈序经校长便是其中一位，另一位恩师是我国有名的电子工程权威冯秉铨教授，即人称的“北孟南冯”（北京清华大学无线电工程系的孟昭英教授，他后来升任华南工学院的院长，对祖国的贡献很大，可惜也于一九七九年去世。）

由于冯院长向陈校长的大力推荐，使我有机会在暨南大学任教十多年，便有幸时常得到陈校长的关怀和教诲，刚好陈校长的公子其津学长，和我都是受教于冯秉铨院长的“高足”，而我的“亲密战友”，也毕业于岭南大学社会系，所以我们与陈校长一家都时有往来。

陈校长虽然贵为校长，却虚怀若谷，平易近人，他为人朴实诚恳，严谨而热情，视师生如子女，他曾在东南亚以及日英美等国留学，不但学术渊博，著述绵绵，蜚声中外，且对办学教育亦有专长，在南开大学服务十四载，一直为我国杰出的教育先辈张伯苓所倚重，南开大学能够成为我国著名学府，陈序经也付出了不少心血。

陈校长为人高风亮节，淡泊名利，表现得非常突出。

新加坡李光耀总理曾聘陈为南洋大学校长，但陈爱国心切，宁愿屈就广州中山大学副校长，而弗就前者，结果李转请林语堂就任。

中共上台前，林云陔任广东省长时，曾聘请陈任教育厅长，宋子文曾请陈任泰国大使，教育部长杭立武又曾请陈任教部次长，这些别人梦寐以求的职位，陈却婉言相拒，又国民党教育部要求各大学校长都要参加国民党，陈坚拒不参。

私立岭南大学校董会规定校长必须是基督教徒，但陈偏不是，因人材难得，校董会只好放弃成见，仍然礼聘陈为校长，一直担任至五十年代院系调整。

中共领导一向不太尊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对陈的学术造诣、教育行政经验和操守，都相当尊重，一九五一年中南局第一把手陶铸来康乐园讲话，他极力推崇陈是：“我国杰出的教育家，希望大家向他学习。”其它党领导人对陈的办学和为人都十分尊重，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陈一生都是无党无派的人士。

大约一九六四年，我们到中山大学马岗顶探望陈校长，他黯然神伤地说要调到天津南开大学，我们听了十分震惊和难过。我说：“您办暨南大学有声有色，海外侨生回祖国读书，年年都增加不少，不但因为您的学术地位，特别开设了中国第一间‘东南亚研究所’，开办了外贸系，中央又特别批准增办医学院，增设图书仪器，扩大海外学术交流等等。有您这样的人才来主持暨大，应当是求之不得之好事，却不明白教育部为何突然作此决定，真是令人费解！”

陈校长很无奈地说：“我自问已是鞠躬尽瘁，我也不明白到底是甚么原因？当然上级的命令只好服从。”

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陈宅，我俩都默默无言，回想陈校长主持岭大的四年（1948至1952），那时正是最困难的年代，内战频仍，经济崩溃，政局不稳，人心向背，但由于陈校长的声望和努力，他积极努力争取了一大批国内外都极负盛名的教授，例如国宝级的历史学家陈寅恪，为了使他能安心在康乐教书及作研究，陈校长还在百忙中亲自到香港动员他夫人回来，他还把去了台湾的数学大师姜立夫争取回来任教，自己的专用小车也经常为教授们服务。

陈校长礼聘来岭南任教的知名学者还有一大批，例如文学学院的王力、容庚、梁方仲等专家，医学院有谢志光、陈心陶、白施恩、周寿恺、陈国祯、秦光煜等，都是各专科的顶级权威，理工学院则有冯秉铨、陈永龄、姜立夫、林为干等以及不少外籍名教授，其它还有许多，都是望风来归，一时间，康乐园成为国内学术权威聚居之所，岭南大学的学术水平和科研风气也急速上升。

由于陈校长主政，岭南大学达到最鼎盛的黄金时代，它的学术水平已追上国内的一流大学，因此，陈校长才被任命为对海外影响至大的华侨大学，即暨南大学的校长。

一九六七年文革期间，我有空到上海探望十二姑何复基，她是党中央派往上海搞地下工作

的负责人之一，是一位革命老干部，解放后曾担任上海市外事处长、机电局长等要职十多年。抗战时她与我姑丈被派往上海做地下工作，刺探日军情报及散发传单，并架设电台发回延安，因叛徒出卖，被日军特务用分区停电及定向雷达破获了电台，姑丈被捕打至重伤，姑姐逃脱后仍然用汽车移动电台继续发报，使日军丧胆，情节十分惊险曲折。

解放后，八一电影厂曾把此真事拍成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相信大陆人都看过多次，十二姑曾在南开读过书，时陈正任教务长，因彼此同乡，她也认识陈校长。我们闲谈时也提到陈突然北调及降职之疑问，她神秘地笑着说：“你当然不会知道，这是中央机密。”十二姑讲，原来竟然是陈序经因遭到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贬斥而遭厄运。

陈校长专长中外历史，对东南亚诸国的历史更有研究，东南亚诸国历史系列，其中之五“柬埔寨历史”(The History of Cambodia)，是香港大公报印刷公司出版，发行人是费彝民，他是中共在香港负责统战工作的左派头目之一，对陈校长很尊重，他明知陈清廉自奉，儿女众多，每个月给陈数百港元作为稿酬，藉以补贴一些家用。

六十年代，刘少奇以国家主席身份，访问东南亚诸国和印度，有好几国的首脑，如柬埔寨的西哈努克亲王，他依总理等都对刘表示感谢说：“贵国学者陈序经先生写我国的历史，很有价值，非常感谢，我国就无此专门人才……”

刘回国后叫秘书一查，原来陈的书都在香港出版，他不去查问清楚，便马上拍桌大怒，认为陈目无组织，有损国家尊严，并说拿稿费就是变相贪污，陶铸等人再三解释，刘在盛怒之下还是一意孤行，下令说：“此人今后永远不能担任正职，调降南开大学副校长”，结果陈校长调南开大学任第四副校长，仅管总务，白白浪费了他的才华。

“其实陈校长能够为国争光，扬名海外，应当给予赞扬，何况那些书，均由左派的机构发行，即使每月支付区区数百元之稿酬，也是作者劳动之应得酬报，试问毛主席那一亿三千多万元人民币的稿费，或者是刘主席一千多万元之稿费，那又如何解释？诚然，刘的这些钱也被首都西城纠察队及清大附中红卫兵抢去，但是否也是‘变相贪污’呢？真是莫名其妙！”我愤愤地说。

虽然临别时十二姑吩咐我们不要将此事外传，但我心里总是忐忑不安，如果陈校长一直被蒙在鼓里，对他很不公，可能会使他抱憾终生，因此我便利用到北京中侨委催问申请出国之事，顺便到天津探望陈校长和表妹万启芬，她也在南大数学系任教，她已是一个积极向党的共青团员，但文革时，因有“海外关系”被南大附中红卫兵揪斗，侮辱，革命小将还在她脸上吐口水，她丈夫是共产党员教研组长，也“划清界限”和她离了婚，可见南大的红卫兵之左得利害，我那时尚未被关入牛棚，所以也能有机会去探访她们。

陈校长见我们到访十分高兴，请吃饭之余还陪我们游览市容，翌日又与我们游览南大附近的水上公园，当我告知他北调原委时，他才恍然大悟，但他胸襟宽阔，仍然强忍愤怒之情，幽默地说：“我陈家店的出品，能够得到各国元首的欣赏，已遂我平生所愿，我一生鞠躬尽瘁，早已问心无愧，只可惜再无机会回暨大和你们畅聚了。”他言时亦怅然若失。

我们见他单身住在教工宿舍，那间百多平方英尺的简陋小房，无人照顾生活起居（因陈太及儿女尚在广州），心中十分不忍，他一生努力为国为民，爱党爱校，却受到如此对待，真是为他不值和叹息。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知道，所谓“革命小将”的红卫兵，因为有大后台，所以无恶不作，而



其中尤以北京的红卫兵最残暴凶狠，相反的，暨南大学的“红卫兵”则绝大部分都是华侨子弟，相对比较讲理也温和得多，倘若陈校长当时尚在暨大，有希望熬过文革之劫。

再者，当时广东的领导，如陶铸、赵紫阳等人都是比较讲政策的开明人士，也了解广东方面的特殊环境，并不像有些北方领导那样，一听到香港、台湾和美国，就马上和“美蒋特务”联系起来，而陈校长曾经为美基会所任命，当然就更难逃一劫了。

据表妹说，当时红卫兵揪斗陈校长的罪名是“美帝份子残余”、“鼓吹全盘西化”、“美蒋特务嫌疑”以及“反动学术权威”等，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南开附中的红卫兵凶狠成性，他在饱受侮辱冲击之后辞世，造反派说他“畏罪自杀”，医务所则说他是死于“心脏病突发”，其实他身体一向很好，在那个恐怖的年代，一个受冲击的臭老九之死，谁也不敢去查问为甚么，可怜的陈校长才活了六十四岁。

想不到刘少奇贵为国家元首，呼风唤雨称雄一世，竟然被人肆意凌辱斗争，最后死无葬身之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陈校长一生为国为民，爱校爱师生，虽死犹生，是真正值得怀念的教育家。

□ 原载《开放》2003年12月号

~~~~~  
【往事如烟】

重庆文革口述史——黄廉访谈录（三）

• 老 田 •

（续上期）

第二天下午，就派车把我们重庆工人造反军200多人拉到锦江宾馆礼堂，群众坐在三楼靠栏杆的地方，头头就坐在楼下第一排。李大章说他们老了，愿意来听听工人的意见，他说：我们还讲不到王力那个好，听听中央的声音，你们回去重庆再去跟鲁大东讲。参加这个会议的还有川大826、红卫兵成都部队和兵团的前身成都工人硬骨头战斗团等。李大章是省长，一副学者气派，这时省委主管工作的还是廖志高，四川省委省政府的部、厅、局长都在会上。

开头我还很担心，准备去念王力的讲话，底下的群众讲，黄老总你不要讲了，下面排队等着讲话的有十几个。我要朱正坤去念，朱正坤根本不念这个，他上台讲自己怎么见了毛主席，然后控诉了重庆当权派怎么迫害他，还说王力那个讲话你们下去自己看，要四川日报印刷厂帮助印五万份发给大家，李大章说“跟他们印，跟他们印”。我感到在成都做事，比重庆还方便。控诉完之后，一些干部说以前我们真的不知道，做官当老爷惯了，恐怕我们成都也好不到哪里去。结果汇报会变成了批斗会，一些成都造反派又把杨超推上去，站在第一排交代问题。

会议结束后，李大章在锦江宾馆礼堂后台休息室召见我们，问我们几时回重庆，是坐火车还是汽车？有人要李大章给经费，有的要他给重庆下指示。他说传单印刷好办，他可以解决车运回重庆去，至于说给重庆下指示，我找一个人来，你们跟他谈，省里面还是志高同志负责。廖志高过来给我写了两封信，一封是写给鲁大东的，还有一封是给军分区的，要他们帮助解决受资反路线迫害的遗留问题。写完之后，还问我满意不满意？对工人造反军的工作，他也表示支持，同意20—30个人脱产，其他人回单位，原来扣的工资要补发，挨批判的同志要道歉。轻工厅还支持我们十辆自行车，成都的造反派还列队欢送我们，红卫兵成都部队虽说是保守的，

但他们对外地造反派也没有什么偏见，对我们也很友好，这更鼓舞了我们的士气，一路上就散发传单。

我们乘坐的列车是晚上半夜到重庆，市委没有人出来接待，群众出来接待的很多，我们就半夜扭起秧歌。几百人没有地方落脚，有建议说回六中，有人说干脆全部住进总工会。第二天满街都是造反军胜利归来的大字报和中央文革的讲话，许多同志就分别回到自己的单位去发动群众，组织自己的队伍。我们在总工会要了两间办公室，当时完全没有想到以后怎么工作，一天都有上万人来访问、串联、交流，总工会的地毯都踩坏了，结果只好收起来。食堂说吃饭的人太多，完全承受不了，造反军总部就出一个通知，说往来串联人员不能在总工会食堂进餐，那个时候的革命权威完全依赖群众的自觉，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也不去食堂打饭了，本来是食堂是给他们准备饭菜的。造反派都是很讲道理遵守纪律的，并不是走资派及其御用文人所攻击的青面獠牙的妖魔。

那个时候，群众确实都发动起来了，真是一派革命洪流不可阻挡的势头，工会的干部也有一部分倾向我们，那些老保干部连班也不上了。

我们在内部就开始健全组织造反军的组织机构，总部下设宣传部由唐工、陈未友负责、联络部是朱正坤、保卫部徐传弟、办公室罗哲光、还有一个关系调解部；作战部是杨国成负责，主要收集情报，比如鲁大东在哪里，李井泉过重庆准备去上海的消息，都是他收集的，准备跟走资派斗。大家都很注意自己的革命气质和作风，如办公室的王英衣服穿得比较好，就有人说不合适，她第二天就换上工作服来上班。总负责人是黄廉、叶祖禄、张厚贵、蒋兆麟、朱正坤、杨国成，机构健全之后，我就把事情交给他们，自己独立想些事情，听汇报，有时还要下工厂去作报告，有时候一天好几场。

这个时候，市委多次派人来找我要廖志高的信，我们不想理他们，因为工厂里面打个招呼，印刷什么的，自己就能够解决，不再有求于他们了，基本上是半夺权状态。社会上支持革命的人已经很多了，我们的影响已经很大了，工人有什么事情也已经不去找他们，而是来找工人造反军解决了，市委基本上是出于半瘫痪状态。到九月底的时候，市委又来找我，要拿廖志高信，我不需要他们帮助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我就一直把廖志高的信揣在身上，不给他们。鲁大东这个时候来找我们，是想借机搞好关系，我们理都不理，也不想见鲁大东了。这时社会上出现传单说：黄廉原来是干部，是任白戈的警卫员，我也不屑于去辨白。总部的工作人员拿中央文革给我们刻的公章，在重庆市公安局批准又去做了一架制工作证的钢印，上面是“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公章和钢印在解散群众组织的“倒旗”运动之后，都上交给重庆军分区保存。

## 五、与老保的最后一战

重庆工人造反军北上告状的胜利，大大鼓舞了工人、农民、机关干部和教育战线的工作者，解除了参加文化大革命的许多顾虑，群众组织宛如雨后春笋一样成长起来。此间鲁大东和他操纵的保守组织都感到很恼火，不少老保、工纠开始反戈，加上我们在大字报里猛烈抨击走资派和保守组织在五十多天的错误，反复申说走资派才是运动的斗争对象，保守组织想要再转移运动方向、阻挡革命已经不可能了。重庆的“工纠”、“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他们也感到受了蒙蔽，但是也还不服气，他们心里有失落感。但那些老保的出身好，大多数也是些正统的优秀工人，有些还是劳动模范，市委号召他们起来反对“假左派”，防止“右派翻天”，他们很多人确实是一些有朴素感情、热爱党的人，只是盲目地听从上级的调度，这样的挫折对他们在精神上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在路线上站错了队，他们批判牛鬼蛇神、搞抄家破四旧，乱打人，都是干部动员的结果。重庆执行抄家、伤害那些出身不好的人，都是在市委的统一部署下，由街道办事处、

派出所和单位保卫科、党委安排的，目的是转移运动的大方向，重庆执行这些路线的人，就是市委组织起来的赤卫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和工纠，正是因为各地的当权派都是这个搞法，毛主席在他的大字报里把这些称为“白色恐怖”。结果对方却是受到中央文革和毛主席的支持的“真左派”，他们深感自己犯了错误，但又不服气，有怨气，鲁大东等人想开个大会示威，利用他们的特权再与造反派较量一次，以便稳住阵脚。

在12月4日这一天，由市委支持，在重庆市体育场召集全市的保守组织开会，有“工人纠察队”“赤卫军”“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等30万人开会。为了帮助稳定保守派的人心，据说鲁大东亲自出席他们的示威大会，准备在会上讲话。妄图继续挑起他们对造反派的新仇恨，因为他们原来的名字已经很臭了，就准备在12月4日这天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改名大会，统一改名为“重庆工人战斗军”，我们八一五派就决定到场造反，工人造反军、北京南下支队和大专院校八一五造反派三股力量，联合冲击了这个号称是30万人的大会场。

保守派开会，市委要给他们发几块钱的补贴，“12·4”这天还给他们发麻饼，最后保守派就被人们称为“麻子兵”，成为老保的代名词。造反派去冲击他们的会场，冲突的开始是他们不让造反派入场，不准我们在大会上宣读中央文件，主席台上开始抢喇叭，会上传出周家喻被老保从主席台上推下来了。因此体育场外就开始冲大门，保守派就动用他们事先准备拿了扁担和棒棒打人，造反派在愤怒之下都赤手空拳冲进去，结果被他们打伤了不少人，造反军的邓胜利、彭韧等30余人伤势严重而住院。尽管如此，造反派还是不惜一切地冲上主席台，保守派作鸟兽散都跑掉了，旗子、袖章丢了一地，有字的衣服都勒令他们脱下来。造反军抓获了30多人，送进总工会，经过询问之后都释放了。老保没有造反派那样的拼命精神，虽然他们准备了武器，结果还是被赤手空拳的造反派冲得人仰马翻。一个南下红卫兵说他亲眼看到鲁大东在台上脸色铁青，坐在那里直摇头，造反派上去的时候他被保镖拥着出去上车走了。造反派欢呼雀跃，我登上检阅台撕毁了保守派的会标和宣传标语，拔掉工纠的旗帜，看到现场一片人潮滚滚的场景，气魄非常大。我感到这就是人民群众的力量，这就是革命的洪流，这就是众怒！

工纠的铁旗杆是用大钢管电焊做出的，有20多公尺长，说他们是铁杆老保就是这么来的。这个旗杆沉重无比，四十多个工人才抬回去，放在总工会造反军总部门口，上面就有很多人贴上纸条，有的写着“向造反军的战友致敬”，有的是给造反军献计献策，还有的是“欢呼铁杆保皇派倒了”。我在这里再次体验倒革命的怒潮和群众运动的力量，只有这样的群众怒潮才能征服修正主义和特权官僚势力。

“12·4”这一天具体打伤了多少人，我不清楚，当时传说有人被老保打死了，鲁大东也很慌张，唯恐出了大事情不好向中央交代，因此市委一声令下，保守派就不再公开活动了。许多传言说当权派把死人放在重钢的高炉里烧了毁尸灭迹，因此一些造反派就要查封火葬场，要各个单位注意当权派的动向，防止他们转移尸体，掩盖事实。一些人甚至说，医院不准收治老保，我说这个不行，我挨个医院打电话过去，要他们不能拒绝任何一个伤员。还有一位女同志拉着我的手哭，说一定要向老保讨回血债！当时是一片传言四起，北京国务院也打电话来问，外地群众组织也问到底死了人没有？全市人民都很关心，但是谁也说不清楚。

这时我感到走资派的狡猾和斗争的复杂性，造反派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工人造反军一无权二无钱，只局限在一腔热血上，怎么能够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呢？12·4这个事件在表面上是我们胜利了，保守组织也被我们冲垮了，但是我们工人造反军能够拿出什么决策？能回答群众的问题吗？我们有能力在全市范围内组织清理排查吗？当时造反派许多人在体育场的主席台上讨论，如何鉴别尸体来源和真假，以及是否进行抬尸游行等等，哈军工的周闯、毛琦坚持要搞抬尸游行，我劝他们要把事情搞清楚，周闯说我右倾，是个小官僚。张金根说老黄主张慎重一些，我认为是恰当的，他不同意小官僚的说法，还有重大的“左左派”徐光明也极力支

持，南下的串联学生几乎是一手包办决策，他们在火葬场找了几具尸体，要通过抬尸游行去控诉走资派对造反派的迫害。他们拿了三具尸体，也不知道死者的单位和名字，连我都不让去看。罗广斌也说要谨慎，同时也劝我说，你也没有什么权力去调查，又说大方向是不能过分去给学生们泼冷水。文艺界的人还编了一首歌《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后来调查证明，拿来的那几具尸体都不是造反派，老保和当权派就借着这个造舆论对我们进行反击。造反派有革命热情，但是没有统一坚强的领导核心，很多人自以为是，基本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有着自由主义的本能缺点，不会思前想后，我提出谨慎的建议，被一些人取笑为胆小怕事和右倾，遭人轰了。火葬场和医院都是走资派控制的，学生能够找到什么样的尸体？最后竟然拿了一具犯人的尸体，是什么人决定拿的，也不清楚，市委很快就拿这个事情大做文章。今天还听到有人唱那首歌，我听心里不是滋味，觉得教训极为深刻。

以前赤卫军和工纠，都是明的，是公开地反对文革。在一二·四那天工纠打伤了很多，造反派拼死一冲，双方以血相见，在这样的精神压力之后，保守派组织在表面上是自行瓦解，实际上也是鲁大东害怕死人，一纸令下的结果。而且在一二·四事件之后，整个重庆谈到“工纠”就是一种耻辱，舆论氛围变换就是如此彻底，公开的保守派已经不可能继续活动了。

造反军受到广泛支持之后，大家的胆子就大了，农民也成立了造反组织。市委说跨行业的组织他们不欢迎，还说造反军里面牛鬼蛇神多，我说要他们那些当官的说你好，文革就不要搞了，我们自己回去按照毛主席说的进行批判，运动矛头就是指向官僚主义。

那个时候杂七杂八的事情不少，什么两口子打架了，也跑到造反军总部来离婚，完全是应接不暇。我们因此下了五条规定，对于反对干部官僚主义和腐败、反对干部特殊化的要支持，抓革命促生产要支持，一切破坏社会治安、不利于文革深入进行的要反对，对于制造干扰的行为要批判和加以限制，其他的事情一律不要去管。

在文化大革命中间，群众组织不是严密的统一体，跟着形势的变化常常有些分化和重组。造反军作为一个全市性的工人组织，也是这样。在造反军总部北上北京告状的时候，留在重庆的同志组织了造反军司令部，为首的是赵慰武、蒋国志、李云成等同志，他的主要功绩是把文艺界的人士组织在一起，举办文艺宣传队，同时创办《造反军战报》。他们也不赞成革联会一派夺权，在根本观点上与总部是一致的，但是办公地点不与总部在一起；67年武斗起来的时候，他们就退隐了。在造反军北上告状的途中，重庆建筑联社中的一些同志编为告状团的一支队，负责人是朱登明同志；返回重庆之后，朱因为在人事安排上与总部有分歧，故将造反军一支队的旗帜先后插在捍卫路、小什字建设银行、新华路、山城电影院等处；一支队在大方向上与总部始终保持一致，也坚持反对一派夺权，没有参与革联会的夺权活动；由于朱登明同志个性好强，在1967年的武斗期间，他们驻在两路口山城电影院的要道上，一次54军的吉普车强行通过他们的哨卡，发生误会射击，致54军张处长死亡，曾辉平重伤，朱登明作为一支队的负责人，因此遭受十多年的牢狱之灾，造反军一支队就过早地停止了活动。还有一个造反军二分团，团长是杨大瑜，他本人也参加过北上告状，是个老造反派；在一月夺权的时候，造反军总部反对没有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夺权，拒绝参加革联会而遭受镇压，杨大瑜转向了革联会，以造反军二分团的名义参加了革联会的夺权，此后二分团就成为八一五派的一个组织，与造反军后来演变形成的“反到底”没有关系了。

12·4事件之后，我曾经和一些造反派头头、各界的有识之士磋商，要将重庆的文化大革命搞好，凭现在的组织展开是不行的。老保已经垮了，为何我们还是这样“内乱”？除了一些客观因素之外，我们自身的严重问题是团结不够、统一不够、联合不够，只有把左派团结和联合起来，成立一个“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更好地把全部八一五的力量凝聚起来。一些同志要我来承头召集，先与八一五派的代表人物周家喻商量。我们在重庆少年宫找到了他，我把

12·4事件之后出现的一些问题作了分析，提出实现大联合实现统一指挥的建议。周家喻说你们工人有责任感，提出的这个建议也很重要，很有价值，这么大的问题要向总团汇报，集体研究之后再决定。

两天之后我们在六中见面了，周家喻说学校总团原则上同意，你看怎么个搞法？我提出的建议是：名称就叫“重庆八一五派联合指挥部”，由八一五总团和造反军先承头搭架子，总团和造反军各派3—9人出来参加联合办公，其他群众组织用召开联席会议的方式，请来参加商议，清他们逐步联合、逐步完善，在工作中间形成信任、责任、地位。我们先进入工作。周家喻认为大范围的工作机构，办公地点要单独地点，而且要有比较好的活动场所，方便群众往来，最后就选在市文化宫。与文化宫协商之后，确定了文化宫图书馆的一栋房子作为办公地点。

重庆大学除了周家喻之外，还派出了师专的聂珍荣、赵云生等九名老师和同学参加联合指挥部，造反军派出了黄廉、陈发荣、张勇、刘忠海等九位同志。二七工人造反团的王庭学也曾经在总部工作过。成立联合指挥部的消息传出之后，深受八一五派群众的拥护。指挥部也很受大家尊敬，办事很有威信。一些群众组织主动找我们协调关系，向指挥部通报情况。我向文联借了一辆吉普车，在大游行时逆着队伍，去重庆大学印刷工作证书，车子上仅仅是贴了一个联合指挥部的标记，街上的群众看到是指挥部的车子，都要停下来让路，游行队伍就自动分开一条路，让我们过去。我们去重庆大学印刷厂办指挥部的工作证，工人都是加班加点赶工。

这样很快就左右了重庆的局势，市委感到很恐慌，对于工人和学生的团结，他们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市委文革会”连续发了三个简报，还特意把简报送到八一五总团。他们散布谣言，说“学生打了天下，轻轻松松让给工人了。”市委连续发了三个简报，说黄廉何许人也，他不姓黄而是姓白，是打入造反派内部的黑手，以前是任白戈的秘书，在本单位是一个流氓，曾经打伤过三个情夫，我对这些鬼蜮伎俩嗤之以鼻，根本不屑去辩解。“黄廉是坏人”怎么能当指挥部政委？重大内部发生了分歧，市八一五总团就给周家喻施加压力，市委又说黄廉有问题，真要有问题朗个承担得起；有些人认为他们最先起来造反，让黄廉去当政委也不舒服，要求解散联合指挥部。

在一月夺权的前夕，我与罗广斌讨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告全市人民书的时候，造反军说重大来了几十个人，包围了办公室勒令秘书陈发荣把公章交出来，熊代富拿到公章之后亲手一劈两半，留一半给我们，宣布解散联合指挥部。罗广斌试着问我，你回去是不是也带几十个人去把八一五砸掉，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把前头的文革都抹黑了。我说还是要顾大局，不能去砸八一五。当时造反军和一些群众组织都恨气愤，要我集中几十个人去砸八一五总团，我制止了他们的冲动情绪，我深知熊代富个人的思想、行为、胆略，他不敢作这样的决策，此举的背后有着重大的黑影。我说还是要把矛头对准走资派，不能去做走资派高兴的事情，不能给造反派丢人。

从熊代富砸了联合指挥部之后，重庆造反军工人和八一五学生就再也没有联合起来过，埋下了后来分裂乃至武斗的种子，后来熊搞武斗也很积极，一切有利于造反派分裂的事情，他都很积极。熊代富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一点都不曾触动他，有人说他是市文革委派进来的，市委也确实一直在保护他，现在也是发了大财。

（未完待续）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国）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思语（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CND》总编：  
陈天寒（美国）

投稿专用地址: 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